

日本學者

中國文學研究

譯叢

● 第六輯

——新時期文學專輯



I 206.7
58
6

日本學者中國文學研究譯叢

● 第六輯

——新時期文學專輯

山田敬三 靳叢林



吉林教育出版社



10009261

(吉) 新登字02号

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 第六辑

——新时期文学专辑

刘柏青 张连第 王鸿珠 主编

责任编辑:戴 宇

封面设计:王劲涛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7 插页
231 000 字

发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册 定价:9.50 元

印刷:长春新华印刷厂 ISBN 7-5383-2011-3/I·53



松井博光 日本杏林大学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



阿部幸夫 日本实践女子大学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
(左为夏衍)



釜屋 修 日本驹泽大学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



岩佐昌暲 日本九州大学
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专家。

序

神戸大学教授 山田敬三

三年前，我们获得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组成《关于“十五年战争”期间中国及日本文坛状况的日中共同研究》课题组，同中国东北地区的学者一起开展共同研究。最近，在日本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版的《十五年战争与文学——日中近代文学的比较研究》（东京·东方书店）、《中日战争与文学——中日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两本书，就是这项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这两本书上虽然标明由东北师范大学吕元明教授和笔者（山田）共同编写，但实际上还有另一位——吉林大学刘柏青教授，也作为第三位编写者参加了此项工作。只是刘先生因为眼疾，忍痛搁笔，加之生来谦逊的性格，退出了表面舞台，他的身影便在该书中变得很单薄。然而，从课题组的组成，到共同研究的整个进展过程中，刘先生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中方撰稿者中有几位就是刘先生的高徒。

共同研究进入正轨后，先是日方的课题组访问了东北地区。当我们即将离开长春时，在等待飞机出发的长春机场候机室里，刘先生突然提起关于本书的编辑一事，时间是1988年9月25日。不过，说实话，对我来讲，这实在是一件很沉重的工作。首先本书

的内容不是我的直接专业，其次，虽然我自知所学浅薄，却也知道日本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水准并不是很高的。

但是，刘先生的意思很坚决，我又素来不善于拒绝自己所尊重的人的请求，终于不自量力地接受了这项重任。在以后的三年里，我还是尝到了后悔的滋味，其原因有三：第一是由于我自己所学不勤；第二点也是更大的理由，即出色的论文可能很少，我的这一担心并非杞人之忧；再者，中国的当代文学常常随着时政动荡不止，连日本的研究者也受其左右。对于那不太愉快的研究历史，我怀着不大想触摸的心情也是不可否认的。

虽然如此，却君子不可失信。为了回报刘先生的期待，我做出了相应的努力。然而，我所怀揣的不安终于不幸变成了事实。日本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比预想的更加贫乏。我所浏览的以现代中国研究为标志的杂志和以现代中国文学为对象的研究刊物，从中很难找到令人满意的论文，其中大部分只是停留于眼前现象的解说，随着中国的政治环境的变化，都失去了作为论文的生命价值。不过我还是从中找出了十几篇似乎能经得起历史批判的论文寄上，不得不说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由于以上种种情况，我的工作一再拖延，对于有关者促写“序文”之类的好意，我也很难动笔回答，结果给刘教授和靳丛林（吉林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二位先生添了莫大的麻烦。借此机会，谨向二位表示衷心的歉意。我真诚地盼望有一天人们不再介意政治气候的变幻，学术世界里的自由空气更加浓郁，并为本书的诞生献上作为编辑者的“祝福”。

1991年6月4日于神户大学

（神户大学博士研究生 胡凯 译）

目 录

关于巴金

——读《随想录》……松井博光 作 靳丛林 译 (1)
“故国八千里 风云三十年”

——王蒙的位置……吉田富夫 作 陈 泓 译 (14)
“二十一岁”的王蒙和“四十六岁”的王蒙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蝴蝶》中三位主人
公的“干预生活论”

……………与小田隆一 作 崔 崑 译 (30)

“文革”的后遗症

——刘心武的《钟鼓楼》和教师魂

……………萩野脩二 作 康晓雷 译 (47)

关于张弦的短篇小说《记忆》

……………岩佐昌隆 作 何茂荣 译
许祖华 校 (60)

姚雪垠的《李自成》……深泽一幸 作 熊黎辉 译 (79)

陆文夫及其文学……釜谷武志 作 郑仁恒 译 (106)

愤怒的群英

——戴厚英、谌容、张洁

……………大石智良 作 胡 凯 译 (132)

追逐梦的作家之蜕变

——王安忆与《小鲍庄》

.....釜屋修 作 叶 笛 译 (147)

口述实录文学《北京人》

——从《华侨日报》到单行本

.....辻田正雄 作 潘世圣 译 (159)

彝族作家李乔.....牧田英二 作 刘桂瑶 译 (184)

舒婷论

——《双桅船》上的母亲之影

.....坂井东洋男 作 李冬木 译 (200)

挫折的诗人

——张贤亮试论之一

.....山田敬三 作 王学谦
秋 实 译 (223)

高行健的戏剧创作.....瀬户宏 作 张福贵 译 (244)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日本

.....松井博光 作 石 山、孙永恩、
李研炎 译 (265)

日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目录索引

.....阿部幸夫 松井博光 作
王俊秋 摘译 (273)

编后记..... (304)

关于巴金

——读《随想录》

松井博光

1. 高举火把的巴金

人依靠什么而生存，可以说是学问与文学最根本的出发点，是普遍性的根本命题。但对文学而言，人受到哪些障碍却比人依靠什么而生存更具有深刻意义。

人是靠爱，靠神，靠自然的天意，靠希望和理想，又像鲁迅揭示的那样，靠对安居在没有出路的传统的闭塞世界中的同胞的绝望，靠憎恶，靠执著的复仇意念而生吧？但是，倘若连死也是由人必须生的所谓生的理念所支配，那么人则思索、表现着生与死。而且人靠爱，靠神或自然的天意，靠希望和理想，又靠绝望、憎恶或复仇意念，有时也靠差别、冷笑或漠不关心而逼近死亡，结果这世界只剩下一片空虚。

然而，我似乎觉得巴金是个愚直的人，他是这样一位作家：降临到这充满空虚、杂乱、欺骗的喧嚣的世界，生在这以民族名义无限再生产着千篇一律故事、蒙着坚硬外壳的传统闭塞的社会中，一面不停地举着微弱希望的火把，无论受到赞赏抑或批判，受到迫害或是无视，却始终探索着人靠何而生，并控诉着碍人碍己的势力。

对自己写过、发表过的作品，巴金始终是固执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作品和读者是怎样的诚实。所以我用愚直来描述巴金，大概是很相称的吧。

2. 执著于自己作品的巴金

巴金初期的代表作《家》，是30年代以来长期为中国众多青年读者热衷的小说，在日本战后也获得了许多读者。据《随想录》105《谈版权》和123《为旧作新版写序》，他说初版刊行后至少修订了8次。每次再版，也总要写上序言或后记。1931年写了《〈激流〉总序》和《〈家〉后记》（最初《家》的题名是《激流》，后来续写《春》、《秋》成三部曲时，再次将这三部作品题名为《激流》），1932年写《献给一个人（代序）》，1936年写《〈家〉五版题记》，1937年是《关于〈家〉十版改订本代序——给我底一个表哥》，解放后有1951年版《后记》，1953年《新版后记》，1957年《英译本后记——和读者谈谈〈家〉》，1977年《重版后记》和《法译本序》，1979年《罗马尼亚文译本序》，1980年《意大利语译本序》，1982年《世界语译本序》。此外，时常谈到《家》的文章还有很多。

看这些序言和后记，巴金有时写道：“我最近重读了《家》，我仍然很激动。我自己喜欢这本小说，因为它至少告诉我一件事情：青春是美丽的东西。”（1957）有时又说“那是在过去发生的事情。至于今天，那更明显，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任务，让读者忘记它们，可能更好一些。”（1977）而1982年他又撤回了这一说法，认为“有一个时期，连我也误认为我的小说早成为‘过去的东西’”。

作为对读者所欠下的债务而回答读者的询问，他每次都对自己的作品加以分析，热情地谈他的创作动机、目的、作品中人物

的原型，以及为何因情况而改变人物的名字，为何将理应死掉的人物在修改后仍然让他活下去。他认为修改作品是必要的，因为那是对读者负责。他始终执著于像自己孩子似的作品，感到依恋不舍。的确，巴金作为一个作者的同时又超越了作者，也是最热心于自己作品的善意的读者。

这类事并不只限于《家》。巴金对自己的其他作品也是反复改订，同样地几次写下了序、跋和后记。虽说日本高龄的井伏鱒二热衷于修改自己的作品已成为话题，但像巴金这样的例子世界上怕也是不多的。例如，在上海事变（1932）中，由于日军炸弹使商务印书馆化为灰烬时，巴金为发表而寄给该社的小说《新生》的原稿也和出版社的建筑物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没有底稿的情况下，他仅用了两周时间就重新写完了这部长篇小说。这件事的原委，在重写的《新生》《自序》中有记录。这种事大概也只有巴金这样的作家才能做到。

1982年，收录了153篇序跋的大部头《序跋集》出版了（翻译和附在他人著作中的文章也收了进来，但数量不多）。然而，巴金对《序》、《再序》和《跋》又作了新的补充（再录到后出的《真话集》里）。如果探寻他修改作品的痕迹，追踪他反复写下的序、跋、后记等文章（这不是一桩简单的工作），大概能够写成一篇巴金论。巴金自己在这本书的《跋》中说：“《序跋集》是我的真实历史。”

3. 《随想录》的刊行

鲁迅亲手引来暗淡而无情的火把燃烧自己，“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是一贯以冷澈的目光凝视着闭塞世界的人生的。而巴金那温暖的小小的火把，好像很难与鲁迅遗留下的闪烁

着宝贵而惊人光芒的无情的火把相比，(巴金与鲁迅有很大的不同，他的文体很难与鲁迅文章隐晦曲折、凝重难解的文体相比，而是直率、轻快的，因而也就平易易读。)他是始终愚直地与各个时期的时局抗争着，以此来证明中国这个寂寞的世界上仍有一点良心的光辉存在，也一定还有宝贵而重要的目标。

那一点良心的光辉，自然在他处女作《灭亡》(1929年发表)以来的众多作品中，甚至更早一些，从他1921年开始在刊物上发表简短的时事评论、自由诗和翻译乃至今天众多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尤其是“文革”以后，在巴金痛定思痛而写下的150篇《随想录》中显得更为鲜明。进一步说，那举着的火把，即令现在将要熄灭，不过是随风摇摆的微弱火焰，也可以看到他的所作所为是怎样的绝望而且愚直。

“文革”后的1977年，巴金回到阔别11个年头的刚刚复苏的文学界，终于打破了长久的沉默。“文革”末期被洗去“反革命”的罪名之后，他首先开始翻译并得以发表(重译的屠格涅夫的《处女地》和30年代以来数次节译的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的翻译)。1978年12月，又开始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随想录》。

《随想录》有150篇，在报纸上连载之后先由香港的三联书店，接着由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依次出版。第一集是《随想录》(香港1979年、北京1980年出版)，第二集《探索集》(同为1981年出版)，第三集《真话集》(香港1982年，北京1983年)，第四集《病中集》(同为1984年)，第五集《无题集》(同为1986年)。全五集中，150篇随想除按发表顺序号排列外，有《总序》和各集的《后记》，再就是作为附录另收三篇文章，即《探索集》中的在京都的讲演稿《我和文学》，《病中集》中的《答井上靖先生》，《无题集》中的在东京的讲演稿《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还有1986

年人民日报社刊行的以《十年一梦》为题的《随想录》的袖珍版选集。日译本五册皆照原名，由筑摩书房出版（石上诏译，1982——1988年）。收在日译本中的原作者的《〈随想录〉日译本序》，曾作为《随想录七十七》收在《真话集》里。

即便在《随想录》里，巴金对自己作品的固执劲儿也没有改变。150篇中，多处是在谈论自己同样的作品，回忆着当时执笔的心境，挂念着读者今天如何去读。在《为旧作新版写序》中，他已经感到时间有限，才决定不再修改《家》了。

4. 巴金微妙的立场

如果要先下结论的话，那么我以为巴金在《随想录》中直率地表明了他的决心，即决不委身于泛滥于世的罪恶。将经历“文革”的体验而获得的痛切的感受，全部直率地公之于世，从这个意义上看，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忏悔录》，但我以为比起这一点来，决不应忽视巴金好不容易获得的能够洞察解放后中国变动无常的种种现象的一个立足点。

但是，中国作家受社会大变动的愚弄还并不只限于“解放后”。即以巴金而言，1927、1928年的“大革命”及其挫折，30年代共产党领导的文学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结成和所受国民党的镇压，以及日中全面战争前夜围绕着“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而引起的激烈论争，对巴金来说，这种时候他总是站在从第一线退后一步的立场上。譬如“国防文学”论争时，他本人参与了鲁迅等被看作反“国防文学”派的团体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的起草，但却没有参加论争。他对围绕着口号的领导权的斗争不感兴趣。每当发生大的变动时，一经觉察，他总是发现了离开处于变动旋涡中的当事人（他们对巴金来说总

是身边的人)的自己而感到愕然。难道不是这样吗?中国在不断地大动荡着,尽管如此,却始终是闭锁的蒙着坚硬外壳而无变化的社会,换言之,在亘古不变的再生产着千篇一律故事的社会实态面前(尽管《家》全面地揭示了这一点),巴金实际是作为一个相信个人的善意和诚实的生活者而生活,无奈时他只能耐心地观察而无其他办法。而一旦忍受不了,他便不得不离开那生活圈子。

“大革命”时期,巴金去了巴黎,在那里写了处女作《灭亡》。关于巴黎之行,他自己几次说明那是为了探索自己的生存方式,但也有人认为那是流亡生活。“左联”时期,1934年末到1935年末近一年时间滞留在日本,也屡屡写作流亡。然而,与其说是流亡,毋宁说是未能逃脱而避难或逃避也许更合适。如果说是从闭塞状况中的紧急避难,那也是为寻求失去光辉的火把的火种,不得已而暂时的一种逃脱。因此,虽有逃脱一次的意思,但说得重一些,目的地却是哪都可以,只要以有点燃火把的焰火能带回为前提(但他没有回成都的家,也许是写《憩园》时,在作品的世界中回去过一次)。但是,正因为离开了“家”,巴金才能够写出没有出路的《家》,正因为逃离了上海,才能写出描写无政府主义破灭命运的《灭亡》。创作《寒夜》(1944年动笔)也决不会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流浪体验无缘。

然而,从“解放后”到“文革”,即使有借口也已经不允许逃脱或逃避了。直到作为以各种名目的代表团成员访问外国,与别国作家们交流,好不容易有了休憩的机会,这都可以从《随想录》中的记述里读到(似也应看到不允许精神亡命的强固的闭锁的社会)。尤其是以访问法国、日本时的回忆写的纪行文或是回忆录之类的文章,在《随想录》中占有相当大的分量,但他在其中所强调的却是对在访问目的地会见的作家和旧友们略呈夸张的热烈的友

情。

5. 《说真话》、《写真话》

从“文革”中的某个时期开始，不，也可以说从以前的“反右派”政治斗争时起，巴金忍耐不住无理的批判，为了正常地生活，万般无奈时想出了一个方法，也可以说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一种灵活运用。勉强正常生活着的幸存的其他作家们大概也都是这样。但悲痛地集中思考这一问题，如实记述下来的却只有巴金。例如他说：

这以后（反右政治斗争后——引者）我就有了一种恐惧，总疑心知识是罪恶，因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不光彩的名称了。我的思想感情越来越复杂，有时候我甚至无法了解自己。我越来越小心谨慎，人变得更加内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真心。我下定决心用个人崇拜来消除一切的杂念，这样的一座塔就是建筑在恐惧、疑惑与自我保护上面，我有时清夜自思，会轻视自己的愚蠢无知，不能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哪里有什么“知识”？有时受到批判、遇到挫折，又埋怨自我改造成绩不大。总之，我给压在个人崇拜的宝塔底下一直喘不过气来。

（125《“紧箍咒”》）

那些年我口口声声“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什么呢？我不用自己脑筋思考，只是跟着人举手放手，为了保全自己，哪管牺牲朋友？起先打倒别人，后来打倒自己。所以就在这个大厅里不到两个月后，我也跟着人高呼“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巴金”了。想想可笑，其实可耻！（146《二十年前》）

我自称为知识分子，也被别人当作“知识分子”看待，批斗时甘心承认自己是“精神贵族”，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69《十年一梦》)

于是我开始有了另一种想法：“伟大的中国人民难道会让骗子们长期横行下去吗？”这以后我经常用这句话问自己，一直到1976年10月。(53《“腹地”》)

“文革”中有一个时期，巴金好不容易止住自杀的念头之后，生的意念渐渐浮起，那是由于对“他们（推进“文革”的人们——引者）的一言一行，我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上”，“我忽然发现在我周围进行着一场大骗局”，于是决意“一定要活下去。看你们怎样收场！”（《十年一梦》）这是他作为作家开始以来，又恢复了他所保持的观察人的目光，而且显得更加敏锐了。例如在《第四病室》（1946年出版）里他是“发掘人心”，而在《随想录》中则常常表现为“探索人心”。因此，“人心”可以换成也可以不换成《第四病室》的译者千田九一氏所说的“人性”（见《现代中国文学全集》第七卷，河出书房1954年）。难道不可说，巴金是从强制性的逼近阿Q的状态中回归到文学的原点上来，通过冷静而彻底地观察人才终于决定要活下去吗？也就是说，在不可能脱逃的情况下，暗中试图精神上的逃避，而且获得了成功。于是作为“幸运的是我找回了失去多年的‘独立思考’”，便宣称“解剖自己的习惯是我多次接受批斗的收获”（84《解剖自己》）。巴金与以为狼的眼睛要吃掉自己的阿Q的区别，大概就在于他是不宽恕自己与他人而解剖自己的作家。一个评论家似乎也对鲁迅说过同样的话。这大概成了深夜中照亮自己和别人所走道路的火把。

终于在1975年，批判巴金的问题由“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名誉上的罪名撤消后，巴金转属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译室，他“下了决心，不再把自己的命